

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方互動分析： 一個時間序列分析的途徑*

黎寶文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主要關注後冷戰時期，面對中國崛起，美中兩強與以「竹子外交」聞名的泰國如何相互應對與影響？本文主要研究問題為：一、促成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之重要政治事件為何？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存在第三方影響？三、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如何相互影響？透過時間序列分析，統計結果佐證911事件對美中泰三角關係產生了結構轉變之效應，而中國政經因素與泰國內政因素之衝擊有限。此外，統計結果也證實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美中互動將促成泰國利用對美政策加以平衡回應，顯示泰國面對大國政治的敏感與謹慎。

關鍵詞：美國、泰國、中國、三角關係、事件資料

* 本文為2020年科技部研究計畫《三角分析的失落環節：第三方影響於印度與東南亞國家避險戰略之應用》（109-2410-H-110-005）部份成果，並曾於2020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口頭發表。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負責，然作者非常感謝陳欣之教授於研討會之評論與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推論與詮釋所提出之各項建議與指正。

壹、前言

泰國一直是擅長於兩大強權間生存的國家，其外交策略被譽稱為「竹子外交」。泰國是美國在亞洲最早的盟邦，兩國的親善關係始於1833年的美泰商務與親善條約（the 1833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泰國的靈活周旋，確保了戰時與戰後的國家利益。進入冷戰時期，中國角色從向輸出共產革命的威脅來源，轉變為美國對抗蘇聯與越共擴張的重要槓桿，中泰關係也隨之變化。而美泰雙方軍事安全合作則奠基於1954年馬尼拉公約（the 1954 Manila Pact）與1962年塔納-魯斯克公報（the 1962 Thanat-Rusk Communiqué）。¹ 即使進入後冷戰時期美泰關係曾經起伏不定，但雙方至今仍維持盟邦關係。

本文研究旨趣主要關注冷戰結束後的「中國崛起」階段。冷戰結束代表三方共同外敵消失，而中國正逐步崛起。中國對東南亞影響力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便持續提升，加上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專注於反恐戰爭與中東事務，美泰雙邊關係開始陷入「後繼無力」的情況。另一方面，美中關係則逐漸由交往合作走向戰略競爭的局面。不論是歐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或川普時期的「印太戰略」，重新定位東南亞的盟邦關係必將是未來美國對中戰略的重要內容。泰國位居東南亞地理中心，也是東協運作的中心成員，深具地緣戰略的重要性，未來可能成為美中兩強的角力戰場。故此，對於過往美中泰三角關係的互動模式，實有了解與探究之必要。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內部運作與互動，與國際政治和全球權力競逐息息相關。進入後冷戰時期與中國崛起作為背景的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互動模式為何？此為本文的研究問題。本文擬由三角關係相關理論著手，採用影響力模式分析，探討三個子議題：第一，促成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之重要政治事件為何？第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存在第三方影響？是否成立三角關係？第三，若是，則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如何相互影響？前者

¹ 馬尼拉條約為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的基礎條約，美國承諾保護泰國免於共產威脅，至今仍為美泰關係重要基石。塔納-魯斯克公報由泰國外長與美國國務卿簽訂，兩國承諾一方遭遇外來攻擊時，另一方必定來援。

將有助於理解現有美中泰三方互動之形成與轉變。後兩者將有助於了解三角關係理論之適用性，同時有助於掌握美中泰三角關係內第三方影響的運作模式。

貳、三方互動理論探討與美中泰關係

如欲以三角關係相關理論探討美中泰三方互動，則應先考量：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符合三角關係之定義？三角關係的構成關鍵在於「第三方影響是否存在」。學者認為三角關係的構成要件有三：一是三個理性行爲者；二是不能有任何一個行爲者被消滅或排除；² 三是第三方影響存在。³ 由前述構成要件推斷，假設現有ABC三個行爲者，第三方影響代表任一雙邊關係受到第三方相關行爲的影響，例如C的相關行爲影響AB關係、B的相關行爲影響AC關係或A的相關行爲影響BC關係。前述任一情況成立，則代表ABC三方互動構成三角關係，因此第三方因素的存在，實為檢定構成三角關係的關鍵。⁴ 後續本文之實證分析若能支持「美國相關行爲影響中泰關係」、「泰國相關行爲影響美中關係」或「中國相關行爲影響美泰關係」任一情況，則代表美中泰三角關係成立，並得以進一步分析第三方影響模式與其內部動力為何。

一、戰略三角途徑與其修正

學界分析三角關係時，常由Dittmer（1981, 485-515）的戰略三角途徑著手。戰略三角途徑強調三角結構類型分析，透過判斷三方之合作或衝突，決定現有三角結構類型。若三角結構能影響三方之動機與行爲，則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由此可知，行爲者的動機是影響未來策略與行動的重要關鍵，而行爲者間之合作或衝突將形成現有之三角結構（吳玉山 1997, 173-83; 2000; 包宗和 1999）。三角關係與國際關係相同，都是不間斷地重複賽局，因此，本階段之三角結構即成爲下一階段之初始風險或機會條件，三方行爲者之利益計算也

² 任一行爲者的消滅將導致三角關係崩潰（包宗和 1999）。

³ 前述三項要件整理自黎寶文（2015, 210-211）、Dittmer（1981, 489-490）、Goldstein and Freeman（1990, 33）。

⁴ 全世界國家共有200多個，任選3個即可符合第1項與第2項條件，因此第3項要件（第三方影響）之存在，實為重要關鍵，也是三角關係案例選擇之重要關鍵。

將持續進行。此外，傳統戰略三角分析假定三方權力均等，吳玉山（2011, 36-38）對此提出「不符政治現實」的批評，特別是當應用於分析美中台三角關係的情況下。就美中泰三角關係而言，中美實力仍有差距，而泰國的重要性應來自於美中對抗的戰略需求，而非自身國力。因此內建「權力均等假設」之戰略三角途徑確有其不足之處。

如何改善戰略三角途徑權力均等假設的缺陷？學理上，權力如何定義可分「權力即資源」與「權力即關係」兩大途徑（Baldwin 2002）。第一，權力即資源（power-as-resource）途徑，其基本假設為國家所掌握的各式物質資源等於權力，例如人口、領土、預算、軍事與經濟實力等。⁵ 吳玉山（2011, 36-41）即透過加入國內生產毛額（GDP）與軍事預算規模對比等變項，建構「非對稱戰略三角」（asymmetrical strategic triangle）模型，以分析美中台三角關係。總結而言，此途徑的因果關係鏈可簡化為「權力資源+三角結構→三方行為」。若三角結構之制約確實存在，則第三方影響存在，同時代表三角關係成立，但三方行為之自由度受到先天權力資源稟賦之限制。

第二，權力即關係（power-as-relationship）途徑，其基本假設為行為受影響而改變即為權力關係，所以權力是一種行為間的因果關係。Dahl（1957）認為：若A能讓B進行原本不會進行之行為，則代表A對B施行影響力。據此，權力與影響力沒有太大區分。擁有資源只代表具備潛在權力，唯有具備影響行為因果關係的能力，才是實際權力。例如，A有槍不代表擁有權力，唯有當A以槍影響B的行為時，A、B之間方發生權力關係（Baldwin 2016, 50）。Goldstein與Freeman（1990）即採「權力即關係」途徑分析三方互動，透過量化美中蘇三方行為之合作/衝突程度，以統計分析三方行為間是否具備因果關係。以「影響力是否存在」確認「權力關係存在」，所以本途徑之因果關係可簡化為「某方行為→另一方行為」。若某方為第三方，則可直接判定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與先天權力資源稟賦無涉，亦毋須先行檢定三角結構為何。

綜合比較上述兩途徑對於原有戰略三角之修正，本文擬採用「權力即關係

⁵ 現實主義陣營多屬本途徑，請見Waltz（1979, 章6）、Mearsheimer（1990）、Tammen et al.（2000, 3-42）。

途徑」修正之三角分析（以下簡稱三方互動模型），進行研究設計，理由有三。一是潛在權力不等於實際權力，也無法作為影響力存在之指標。透過「權力即資源」途徑修正之戰略三角分析，仍無法回答某方潛在權力資源「何時」與「如何」得以影響他方行為？二是跨領域之權力資源難以測量與評估。「權力即關係」途徑透過直接觀測行為結果方式進行推論，可迴避不同領域權力資源之權重問題。⁶ 三是第三方影響存在與否是三角關係成立之關鍵，「權力即關係」途徑中明確的因果關係鏈，可有效協助判定第三方影響之存在。目前學界已有運用三方互動模型於南斯拉夫內戰、中東區域衝突等前例。⁷ 然而，運用類似途徑用以分析美中泰關係之嘗試則幾乎沒有，遑論回應三角關係的基本問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符合三角關係之定義？第三方影響如何運作？

二、避險戰略與泰國外交

學界目前對於東南亞國家外交政策之研究，大部分都是以後冷戰時期美中競爭下的「避險」（hedging）脈絡加以詮釋。現實主義之結構分析顯示，後冷戰時期之多元體系容易導致衝突（Waltz 1979, 章8; Mearsheimer 1990; Friedberg 1993）。東南亞國家採行避險外交，本質就是一種「風險迴避」，用以因應後冷戰時期美國戰略轉變與中國崛起可能的衝突與高度不確定性。Roy（2005）曾將泰國之避險模式定義為「典型避險」（simple hedging），意指同時與美中兩強維持良好關係，並隨時兩面討好。⁸ Goh（2008, 133）認為泰國與新加坡之外交行為同屬於對中國「間接制衡」（indirect balancing）類型。其主要手段為透過與美國「共享安全利益」為由，維持美國軍事力量的區域存在，但決不言明以中國軍事威脅為目標。郭清水（2008）則是將「避

⁶ 「權力即關係」途徑只能「迴避」不同領域權力資源之權重問題，但恐無法解決該問題。然Mattern認為（2008, 696-697）權力具備不同面向與形式（forms），目前沒有可以滿足每一個途徑的基礎，只要擬出一組符合需求具備一致性基本假定即可。因此，本文擬採用「權力即關係」途徑，而非嘗試建構彌補現有各途徑缺陷之完美途徑。

⁷ 南斯拉夫內戰各方互動分析，請見Goldstein與Pevehouse（1997）、Pevehouse與Goldstein（1999）。中東區域衝突分析，請見Joshua S Goldstein et al.（2001）。

⁸ 該研究尚提出其他避險模式，包含對中低度制衡、對中高度謹慎型之制衡、對中扈從等。

險」定義為位於「單純制衡策略」(pure balancing strategy)到「單純扈從策略」(pure bandwagoning strategy)兩個極端值之間的不同程度之行爲。泰國與馬來西亞的外交政策都屬於最靠近單純對中扈從的「有限扈從」(limited-bandwagoning)，強調政策協調與自願配合之夥伴關係，而非單純接受中國支配。⁹然而，上述學者之靜態類別並分析無助於推論行爲互動過程中所呈現之權力關係與行爲模式，同時其研究目的爲發展「避險」理論，僅將後冷戰時期之美中戰略競爭當作背景或控制變項，著重泰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之比較，而缺乏對於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爲互動之因果分析與精確描述。更嚴重的是，前述幾位學者研究時間相近，但對於泰國在美中之間的避險行爲模式，顯然並沒有一致的共識。¹⁰

既然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國家避險行爲，大體都在美中戰略競爭的現實環境下展開。¹¹因此，連結泰國與美中兩強的三方互動研究設計，確爲合理研究策略。過往相關研究也普遍認爲美國全球戰略轉向、中國經貿因素與不干涉主義、泰國政變與社會對抗，是影響三方互動最重要因素(Zawacki 2017; Prasirtsuk 2017)。而進入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角關係中泰國外交政策最值得關注之趨勢有二。第一，泰國由親美轉向親中之變化(Mathews 2003)；第二，泰國的行爲風格由「竹子隨風搖擺」(bamboo bending with the wind)彈性戰略風格，轉變爲「竹子遭風擺弄」(bamboo swirling in the wind)的短期利益追求。¹²前述轉變發生之主因皆爲：泰國的軍事與政治菁英各自政權存續的考量，以親美或親中爲手段進行個人短期利益計算(Busbarat 2017; Hewison 2018)。Pongsudhirak (2016; 2017)亦認爲泰國的國內政治，特別是軍政府

⁹ 該研究認爲若將避險行爲視爲光譜，由對中強硬的單純制衡到受中支配的單純扈從，共有五個不同程度避險行爲：間接制衡、拒絕支配、經濟務實主義、有限交往、有限扈從，其中經濟務實主義可以視爲光譜中間點。

¹⁰ 由於避險的概念與行爲模式仍屬於理論發展階段，因此各式行爲類別與定義常依學者而異，例如軟性平衡、制度平衡等模式，請見He (2008)、Goh (2007)。

¹¹ 根據吳崇涵(2019)對東亞國家避險行爲之實證研究，對中實力差距與美國軍事存在皆是影響東亞國家在美中之間避險行爲的重要因素，顯示傳統現實主義因素仍是重要變項。

¹² Busbarat (2016)認爲「竹子隨風搖擺」意指泰國透過彈性外交作爲維持國家利益，但「竹子遭風擺弄」則代表泰國外交決策毫無目標，且傷害國家利益。

的利益計算優先，已經主導了泰國的外交雙層賽局，一方面尋求北京的政治認可支持，並放任美泰關係「表現不佳」（underperformed），但一方面仍期盼未來美泰關係能夠重新調整。簡而言之，學界研究大抵歸納出美國戰略、中國影響力與泰國內部政治是影響泰國對外決策之三大重要因素，但進入後冷戰時期後，國內政治因素已經成為影響泰國外交政策之主要變項。

綜觀前述傳統途徑的美中泰三方互動研究與避險戰略相關探究，不難發現缺憾有三。第一，第三方影響之存在是確認三角關係成立之前提。前述研究皆缺乏確認定第三方影響存在的檢證過程。第二，前述研究所得出之各類行為模式皆過於籠統，難以精確描繪其變化與因果關係。例如，泰國親中或親美之轉向，應由「泰國對美行為」與「泰國對中行為」之變化來完成。同理，不論是間接制衡或有限扈從，同時都包含對中與對美行為的協調。前述研究都缺乏將前述泰國對中行為與泰國對美行為區分探究其驅動成因的研究設計。第三，前述研究多著重於泰國在美中雙方之平衡，卻忽略三方互動的多樣性。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美國為中泰關係的第三方，中國為美泰關係第三方，泰國為中美關係第三方。在此三組雙邊關係中，第三方影響是否皆為顯著？再者，黎寶文（2017）研究指出，第三方影響具備多種樣態，包含「直接第三方影響」、「對第三方之權力平衡」、「對第三方之自我調適」等，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存在這些樣態？綜上所說，現有文獻仍有缺憾，而本文擬由第三方影響力模型著手，分析美中泰三角關係之內部互動因果關係。

參、美中泰三方互動之研究設計

回顧Goldstein與Freeman（1990）以降之三方互動研究，基本上皆具備以下兩個特性。第一，1組雙邊關係等於2個國家之相互行為。故美中泰三角關係包含美中關係、美泰關係、中泰關係，而美中關係等於美國對中行為（UC）與中國對美行為（CU）；美泰關係等於美國對泰行為（UT）與泰國對美行為（TU）；中泰關係等於中國對泰行為（CT）與泰國對中行為（TC）。所以，美中泰三角關係應包含上述6個具備「方向性」的國家行為。這樣的研究設計更有利於研究者掌握影響力的作用方向與行為互動的因果關係。第二，三角關

係中的影響力模式具備多種樣態，而本文最重要研究問題在檢定第三方影響之存在，以確認三角關係是否成立，並探討其內部互動模式。經參考相關文獻後，美中泰三角關係之第三方影響力模式可假設如下：¹³

H1：直接第三方影響模式：第三方主動對本國之行爲得以影響該本國對對手國之行爲。此情況通常代表第三方具備直接影響該雙邊關係的能力，共有6種情形：

- H1-1 前期中國對泰行爲（CT）影響本期泰國對美行爲（TU）
- H1-2 前期中國對美行爲（CU）影響本期美國對泰行爲（UT）
- H1-3 前期美國對中行爲（UC）影響本期中國對泰行爲（CT）
- H1-4 前期美國對泰行爲（UT）影響本期泰國對中行爲（TC）
- H1-5 前期泰國對美行爲（TU）影響本期美國對中行爲（UC）
- H1-6 前期泰國對中行爲（TC）影響本期中國對美行爲（CU）

H2：間接第三方影響模式：除了直接第三方影響外，與第三方相關之其他行爲，也可能對其他兩位行爲者發生影響，可歸納爲以下2種模式：

H2a 對第三方權力平衡：此情況代表第三方具備間接制衡或影響1組雙邊關係之能力。第三方與對手國之互動，將引發本國反制或調整，與權力平衡邏輯類似，共有3種情形：

- H2a-1 前期美中關係（UC, CU）影響本期泰國對美（TU）或本期泰國對中行爲（TC）
- H2a-2 前期美泰關係（UT, TU）影響本期中國對泰（CT）或本期中國對美行爲（CU）
- H2a-3 前期中泰關係（CT, TC）影響本期美國對中（UC）或本期美國對泰行爲（UT）。

¹³ 主要參考Goldstein與Freeman（1990, 74-84）、黎寶文（2017, 7-11）。

H2b 對第三方自我調適：一方主動運動對第三方與另一方之行為，產生議題連結或政策外溢的效果。此情況代表在本國主觀認知或國內決策過程中，對第三方或對對手國之關係實為一體兩面，難以切割，共有3種可能情形：

H2b-1 前期美國對中行爲（UC）與本期美國對泰行爲（UT）相互或單方面影響。

H2b-2 前期中國對美行爲（CU）與本期中國對泰行爲（CT）相互或單方面影響。

H2b-3 前期泰國對中行爲（TC）與本期泰國對美行爲（TU）相互或單方面影響。

爲符合上述研究問題與設計，本文擬運用「整合性危機早期預警系統」（integrated crisis early warning system，以下簡稱：ICEWS）資料庫檢定上述第三方影響模式假設。¹⁴ ICEWS資料庫時間範圍包含1995年1月至2020年3月，共計303個月。ICEWS資料庫透過電腦程式（BBN Accent event coder）判讀蒐集全球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新聞報導而來，新聞來源約有300家媒體（Boschee et al. 2015c, 1; 2015a, 5）。每一筆觀察值都是「A對B做了什麼」（who did what to whom）格式。此格式有助於區分雙邊關係中的相互行爲，符合本文研究設計。ICEWS資料庫記錄之行爲皆採用「衝突與調停事件觀察」（Conflict and Mediation Event Observations，以下簡稱：CAMEO）行爲目錄加以歸類（Boschee et al. 2015b）。歸類後，採用Schrodt（2007）建立之評分量表，對CAMEO目錄中所有行爲給予行爲分數。行爲分數代表合作或衝突程度，合作行爲之分數皆爲正數，而衝突行爲之分數皆負數。數字越大代表程度越高，10分代表合作程度最高，-10分代表衝突程度最高。行爲分數的正負紀錄方式，有助於研究者量測國家行爲可能同時具有衝突或合作的意涵，傳遞合作或衝突之意圖。另外，關於時間分析單位，參考ICEWS資料

¹⁴ 本資料可由哈佛大學網站取得，請見Elizabeth Boschee et al. (2015d)。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

庫本身即提供以「月份」為單位之資料集（Lautenschlager, Shellman, and Ward 2015）。本文將以「月份」作為時間分析單位，並加總該月份內行為發起者A對行為接受者B之行為分數，作為該月份A對B之合作/衝突程度。綜言之，本文之分析單位為「三角關係中某國對另一國之行為分數/月份」，此為後續統計分析之基礎。

依據本文對三角關係之定義，美中泰關係等於美中泰三方互動行為，應包含下列行為變項：美國對中行為（UC）、中國對美行為（CU）、中國對泰行為（CT）、泰國對中行為（TC）、美國對泰行為（UT）、泰國對美行為（TU）。¹⁵ 此一操作型定義已包含三角關係中所有可能之行為變項，本文將據以觀察過去某一行為變項是否影響現在另一特定行為變項，以分析三角關係內之影響力模式與檢定第三方影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擬採向量自我迴歸（vector autoregression，以下簡稱：VAR）方法進行統計分析，以確立行為變項之間是否彼此影響。此模型特別有利於探索多個變項間的因果關係，而無需預先區分變項為外生性或內生性（Sims 1980）。就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內部互動而言，本文假定本月之美中泰三角關係為過去三方互動之結果，據此，美中泰三角關係可表現為一組六個方程式構成之模型：

$$UC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quad (1)$$

$$CU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quad (2)$$

$$CT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quad (3)$$

$$TC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quad (4)$$

$$UT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quad (5)$$

¹⁵ 前述6項行為之每月行為分數分佈圖，請見附錄1。

$$TU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quad (6)$$

美中泰三角關係由6個國家行為所構成，因此共有6個方程式加以分析。¹⁶ 每一個行為分別受到過去三方互動的影響，因此等號右邊的解釋變項（自變項）為過去的三方互動，亦即三角關係中6個行為的落後項。上述6式中， C 為常數項， t 為時間，所以 $t-i$ 代表落後 i 月（或可詮釋為前 i 個月），而 t 代表本月份。 Σ 代表加總， Σ 之下標 $i=1$ ，代表由落後1期（前1個月）開始加總，上標為 n 代表終止加總於落後 n 期。時間序列模型的關鍵之一，即在於落後期數的選擇，本文之設定為 $n=2$ ，亦即本文之落後期數為2期（前2個月）。¹⁷ 換而言之，上述6式等號右邊的各個解釋變項，都由落後1期加落後2期的解釋變項構成，也代表本文假定本月的美中泰三角關係是過去2個月三方互動加總之結果。

肆、美中泰三角關係文獻中的結構轉變事件

本文所定義之「結構轉變」（structural break）意指透過統計學的鄒檢定（Chow test）測試特定時間點前後，線性迴歸係數是否不相等的現象，而並不同於國際關係權力分佈結構之轉變。¹⁸ 就本文研究問題而言，解釋變項迴歸係數用以解釋美中泰三方原有之影響力模式（或規模），因此結構轉變代表該時間點或特定事件所帶來之政治衝擊，改變了美中泰三方原有之互動模式或

¹⁶ 經檢測美中泰三角關係內6個行為變項皆為定態（stationary），非自我相關條件異質變異（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以下簡稱：ARCH）序列。但都有自我相關（serial correlation）問題，因此必須納入依變項之落後項加以修正，檢測結果請見附錄2。

¹⁷ 經統計檢定，在5%統計水準下，落後1期之結果與落後2期之結果為顯著差異，但落後3期與落後2期之結果，則無顯著差異。由於落後期數太長容易造成推論無效率，太短則可能影響模型解釋力，故本文決定落後期數為2期。此選擇代表本文之推論僅限於，平均而言，前2個月對本月之影響，無法確保超過3個月以上之三方互動效應，此為本研究之重要限制。

¹⁸ 事前鄒檢定之檢測，通常為統計學時間序列分析之標準程序，通常用以確定分期時點，分析請見Chow（1960）。

影響規模。如果確有結構轉變發生，則應選擇只納入未轉變時段之觀察值，確保迴歸係數穩定，避免影響推論。此一檢證過程也有助於探討美中泰三方之內部動力，回應本文研究問題之一：後冷戰時期改變美中泰三角關係既有結構與互動模式之重要事件為何？

傳統分析途徑文獻已歸納：美國的全球戰略轉向、中國的經貿攻勢與不干涉主義、泰國的政變與社會對抗是影響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方互動的三大因素，也是泰國由親美轉向親中的重要原因。基於此，本文擬先行探究美中泰關係相關文獻所關注之歷史事件是否造成「結構轉變」的效果。

自1995年以來，美國全球戰略自中東轉回亞太，再發展為對中戰略競爭的過程，可歸納出下列四個重要節點分別為：

一、2001年9月，911恐怖攻擊事件：911事件扭轉了美國全球戰略排序，中國由「戰略競爭者」變成美國反恐戰爭與防治武器擴散的合作夥伴（Shambaugh 2002）。另一方面，美國也重新建構與東南亞國家之關係，以應對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陳佩修 2010; Bunyavejchewin 2012）。作為條約盟邦，泰國也必須支援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並於2003年獲得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盟邦」（major non-NATO ally）地位。¹⁹

二、2011年10月，美國提出「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戰略（Clinton 2011）：911事件以來，出於反恐戰爭優先性，美中於軍事或經濟領域皆持續維持建設性合作關係，歷時十年。面對日益發展的中國，美國開始認為未來全球戰略的重心應轉回東南亞與亞太地區（Prasirtsuk 2013）。但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轉向進展有限，對東南亞與泰國之經營口惠多於實質。此外，泰國軍事政變和威權統治與美國民主價值有所衝突，也成為本階段美泰關係發展的阻礙（Pongsudhirak 2016, 65）。

三、2017年11月，美國提出「印太戰略」：川普總統提出「自由開放印太區域」（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概念作為印太戰略基本框架後，美國揚棄過去以「交往」與「合作」為主軸的對中政策，並將中國定位為「戰略對

¹⁹ 但泰美雙方合作與矛盾兼具，請見Chambers（2004）與Zawacki（2017, 章8）。

手」、「修正主義國家」。²⁰ 而爲了因應中國帶來之戰略威脅，東南亞區域角色日益重要（Pongsudhirak 2018），美國也益發強調盟邦與戰略夥伴關係在未來印太戰略中之角色（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泰國位居區域樞紐與東協核心，更是美國推動印太戰略不可忽視的重要盟邦。

四、2018年3月，美中貿易戰：除了政治與軍事面向的對抗外，美國更著手透過關稅與其他制裁手段，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過去中國崛起的基礎來自於經濟成長，而中國的經濟成長是建立在官僚資本主義、偏差法律制度、智慧財產竊盜、網路竊密與選擇性遵守國際規範等不公平手段上。對於美國而言，自由、開放、法治爲主的國際秩序（free, open, and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是美國與盟邦長期共享之利益，而中國追求經濟成長的手段已經明確挑戰相關之國際秩序（United States 2020）。美國展開貿易戰也代表著新一階段美中競爭，已直接挑戰最爲本質的經濟基礎，與傳統的政治軍事競爭有所不同。

就中國影響力而言，中國的經濟誘因與習近平的外交風格是過往文獻探討近期中國國際行爲的重要變數，分述如下：

一、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始於泰銖大規模貶值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選擇以不競貶與經援相挺，贏得東南亞國家的支持。而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IMF）之作爲，則導致東南亞國家普遍不滿。²¹ 泰國於是轉向區域合作，透過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東協加三（ASEAN+3）、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等機制強化與中國合作（Pongsudhirak 2016, 67-68）。

二、2003年10月，中泰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此爲中國與東協國家首個雙邊自貿協定。2007年中國即成爲泰國第二大貿易夥伴，但也導致泰國對中的鉅額貿易逆差，農業與工業都面對中國的廉價競爭（Chantasawat 2006）。

三、2013年11月，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2012年11月，習近平上台後，對外關係上，中國過往的「韜光養晦」與「和平崛起」原則已被「敢於亮

²⁰ 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爲修正主義國家（United States 2017）。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綱要》則將中國列爲首要戰略對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²¹ 泰國對於美國政策與國際貨幣基金的不滿，請見Zawacki（2017, 138-143）

劍」與「中國夢」取代。此後美中戰略競爭態勢逐日漸增，雙方都有爭取泰國以弱化對手的動機。中國對東南亞的戰略多以經濟發展誘因為主，而「一帶一路」正是其具體實踐。「一帶一路」具體落實為正式國家戰略的時間點為2013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希望透過強化與東南亞國家之經貿與基礎建設合作，增加區域與外交影響力。²² 然而，近年實證研究顯示，一帶一路之具體影響可能有限（薛健吾 2020）。

就泰國內政而言，後冷戰時期泰國政治發展的最重要關鍵在於：塔克辛執政促成泰國轉向「經濟發展」、「親善中國」的經貿路線。²³ 即使泰國在2006年後陷入政變與選舉的無限迴圈，民選菁英與泰國軍方皆無意改變既有親中路線。中國之「不干涉內政」與「尊重他國主權」立場，也廣受泰國政治與軍事菁英支持，讓中國提升對泰影響力。而美國擺盪於民主價值與政治利益之間的猶疑，反而導致美國對泰影響力日趨低落（Pongsudhirak 2020）。自1995年以來，泰國國內政治發展之重要節點為：

一、2001年2月，塔克辛出任總理：塔克辛政權的選舉優勢挑戰了泰國政治傳統上民選政府、軍方、王室三方權力平衡的默契，也埋下2006年與2014年軍事政變的遠因。²⁴

二、2006年9月，軍事政變推翻塔克辛政權：此前泰國軍方已經15年未發動政變，但軍方仍然選擇推翻史上第一位任滿連任，享有國會多數席次與民意支持的泰國總理，其後，泰國即陷入「政變／選舉」的政治迴圈（陳佩修 2009b）。本次政變後，隔（2007）年12月重新舉選舉，恢復民選政府。

三、2014年5月，軍事政變推翻盈拉（Yingluck Chinnawat）政權：當時總

²² 對泰國而言，一帶一路在東南亞最重要的計畫為「中國-印度支那半島經濟走廊」（China-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而中國與泰國共同參與的「瀾滄江-湄公河合作」計畫（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可視為該經濟走廊計畫之先期準備，相關中泰互動分析，請見Busbarat & Bunyavejchewin與Suporn（2021）。

²³ 關於塔克辛轉向之政治分析，請見Zawacki（2017，章7）。

²⁴ 2006年政變，雖然推翻了塔克辛政權。但2007年泰國通過新憲後，軍政府重新還政於民。在多次選戰與社會運動對抗中，獲得塔克辛支持的政黨分別於2007年與2011年重新執政，直到2014年再次軍事政變，相關分析請見Pongsudhirak（2020）與陳佩修（2009a）。

理盈拉為塔克辛的妹妹，其自2011年領導為泰黨勝選取得政權。2013年12月，盈拉解散國會，預計2014年2月舉辦國會大選，卻因反對黨杯葛與阻撓，選舉無法順利舉行，同年3月被憲法法院宣告違憲而無效。5月，軍方以「恢復和平，終止暴力」發動政變。直至2019年3月，才再次舉辦大選。

為確認上述事件是否造成美中泰三角關係的結構轉變，本文以鄒檢定進行檢測。由於美中泰三角關係共有6個行為方程式，每個事件都在第1式到第6式中執行鄒檢定，相關檢定結果如表1，相關意涵說明如下。²⁵

第一，911事件是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最重要的因素。總體來說，雖然本節之結構轉變檢定是個別進行，但是否造成三角關係整體結構轉變，必須綜合考量。表1顯示，美國對中行爲（UC）、中國對泰行爲（CT）與泰國對中行爲（TC）共計3個國家行爲，因為911事件而發生結構轉變。對比於中泰自貿協定簽署（1個）與塔克辛執政（2個）的檢驗結果，顯然911事件結構轉變之影響規模最大。因此，後續統計分析應以2001年9月為期區分前後進行分析。鑑於911事件前之觀察值數量過少（僅有80個觀察值），本文將以911事件之後的觀察值（2001年9月到2020年3月，共223個觀察值）於下一節進行三方互動分析。

第二，就美中關係而言，911事件主要改變了美國對中國行爲模式，而非中國對美行爲。表1顯示，以911事件作為分期點，僅有美國對中行爲（UC）發生結構轉變，中國對美行爲（CU）則未達顯著標準。此結果也提示戰略三角類型分析之不足，未來的三角關係研究，應該要注意將一個雙邊關係視為一個整體的可能偏誤。此結果代表美國對中政策產出的影響因素和模式已經因

²⁵ 鄒檢定透過在各方程式中加入1個虛擬變項（以0或1代表事件發生前或後），然後納入該虛擬變項與各解釋變項的互動變項，以檢測新增變項是否對原方程式造成顯著差異。以911事件是否對美國對泰行爲（UT）產生結構轉變測試為例，下列第1式為原式，第1a式為加入911事件虛擬變項與各互動變項（如黑體標示）之檢驗式。鄒檢定即是檢測兩者有無顯著差異，比較兩式後不難發現，鄒檢定加入互動變項之設計正符合本文預設結構轉變事件也可能對三角關係整體產生影響之邏輯。

$$\begin{aligned}
 UT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C \\
 UT_t &= \sum_{i=1}^n UC_{t-i} + \sum_{i=1}^n CU_{t-i} + \sum_{i=1}^n CT_{t-i} + \sum_{i=1}^n TC_{t-i} + \sum_{i=1}^n UT_{t-i} + \sum_{i=1}^n TU_{t-i} + \mathbf{911} \\
 &\quad + \mathbf{911}(\sum_{i=1}^n UC_{t-i}) + \mathbf{911}(\sum_{i=1}^n CU_{t-i}) + \mathbf{911}(\sum_{i=1}^n CT_{t-i}) + \mathbf{911}(\sum_{i=1}^n TC_{t-i}) + \\
 &\quad \mathbf{911}(\sum_{i=1}^n UT_{t-i}) + \mathbf{911}(\sum_{i=1}^n TU_{t-i}) + C
 \end{aligned} \tag{1a}$$

表1 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檢測結果一覽表

潛在結構轉變事件	時間	檢測結果
美國戰略因素		
911事件	2001年9月	UC** CU+ UT TU CT** TC*
重返亞太戰略提出	2011年10月	UC CU UT TU CT TC
印太戰略提出	2017年11月	UC CU UT TU CT TC
美中貿易戰	2018年3月	UC CU UT TU CT TC
中國政經因素		
亞洲金融風暴	1997年7月	UC CU UT TU CT TC
中泰自貿協定簽署	2003年10月	UC* CU UT TU CT TC
一帶一路提出	2013年11月	UC CU UT TU CT TC
泰國政局因素		
塔克辛執政	2001年2月	UC** CU* UT TU CT TC
2006年軍事政變	2006年9月	UC* CU UT TU CT TC
2014年軍事政變	2014年5月	UC CU UT TU CT TC

說明：1.+、*、**分別表示在10%、5%、1%統計水準顯著。

- 2.若特定事件之影響在5%以下統計水準顯著，則推論為特定事件對該行為產生結構轉變之效果。
- 3.本表之結構轉變依鄒檢定模型意涵，意指特定時間點前後，線性迴歸係數不相等的現象，而並非意指國際關係權力分佈結構之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以ICEWS資料庫檢定所得。

911事件而發生變化，但是中國對美行為的既有影響因素和模式，並沒有因911事件而發生顯著變化。據此，不難推斷911事件並未明顯改變中國對美行為的既有行為模式，但美國出於全球反恐戰略之需要，改變了既有美國對中行為模式。不論是「建設性合作關係」或歐巴馬時期的「積極、建設與全面性關係」，其本質都是美國因反恐戰爭而需要各國支持。中國作為亞太重要強權，更是美國希望擱置人權問題、武器擴散、台灣問題、飛彈防禦系統等

爭議，積極爭取之對象（Shambaugh 2002）。表2另整理了911前後上述發生結構轉變的國家行為變項平均值，美國對中行爲（UC）911事件後行為分數平均值確有增加，顯示美國對中行爲趨向合作的趨勢。此外，表1結果顯示，習近平上台後之「一帶一路」戰略、歐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與川普時期的「印太戰略」與美中貿易戰並未對美中泰三角關係產生結構轉變效應。

表2 911事件影響相關變項之前後行為分數比較

	911事件前行爲分數平均 1995/1-2001/8	911事件後行為分數平均 2001/9-2020/3
美國對中行爲（UC）	288.60	556.03
中國對泰行爲（CT）	38.88	47.55
泰國對中行爲（TC）	34.36	43.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ICEWS事件資料庫。

第三，就中泰關係而言，中泰兩國的互動行為，同時都因911事件而發生結構轉變。根據表1，中國對泰行爲（CT）與泰國對中行爲（TC）分別在1%與5%統計水準下顯著，代表影響中泰關係的因素與模式，在911事件的前後，有所不同，但鄒檢定結果並無法說明「究竟有何不同」。因此，若由表2觀察911事件前後之差異，不難發現，911事件後，中泰兩國都加強兩國相互間的合作關係，兩者行為分數平均皆為增加。這個結果代表ICEWS資料庫記錄數據顯示中泰兩國相互合作親善程度有所提升，也代表中泰關係合作程度提升是雙方有意為之的結果。²⁶ 表1中更值得注意的結果是，2006年與2014年兩次軍事政變事件，並未促成中泰關係發生結構轉變。此一結果代表即使2006年後軍事政權與民選政府交替執政，亦未改變中泰關係的既有發展趨勢。綜合表1與表2的結果，鄒檢定結果顯示911事件確實對於中泰關係造成結構轉變效果，卻

²⁶ 表2以911事件作為分期之平均數比較，代表預設接受表1之結果，亦即以911事件造成中泰關係結構轉變為前提，僅透過表2之平均數比較作為補充說明，亦無法推翻表1鄒檢定確立之因果關係。

無法說明911事件如何改變中泰關係。此外，行為分數平均數比較顯示，911事件後中泰關係確有改善之現象。此為雙方有意為之，同時作為的結果，並非單方面「一頭熱」所致。

第四，進入21世紀後之美泰關係，並非「美泰關係惡化，中泰關係合作」，比較準確的詮釋應該是「美泰關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表1結果顯示911事件並未促成美泰關係（UT, TU）的結構轉變，但卻對中泰關係（CU, UC）產生結構轉變效果。此一結果代表影響美泰關係的因素與模式，並未因為911事件而產生轉變，但是影響中泰關係的因素與模式卻有所變化。然而，表1結果並無法說明中泰關係如何改變，或改變了什麼，此亦為鄒檢定模型有所不足之處。綜合表2中泰關係合作程度增加結果判斷，中泰關係合作升溫確實為明確之現象。由現實運作來觀察，美泰互動既有之模式的確穩定不變。即使泰國的軍事統治或民粹威權均未獲美國支持，且中國從不批評泰國內政，多強調互惠發展。但美泰之間的各项軍事與安全協定依然有效運作至今，並未破棄。金色眼鏡蛇等各项軍事演習，即使規模有所改變，卻仍然是印太區域規模最大的年度跨國演習。美國反恐作戰期間，儘管塔克辛政權的外交策略是「亞洲優先」、「中國親善」，但泰國所提供之後勤與情報支援，特別是機場與港口的服務，仍滿足美國對於盟邦的期待。²⁷ 不論是全球反恐、重返亞太或是印太戰略各時期，美國視泰國為重要亞洲盟邦的立場從未改變。綜合統計實證與現實運作，「美泰關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的描述，遠較於一般所強調之「泰國轉向親中」更為精確。

第五，泰國內政因素與中國經貿因素之影響，並不如傳統分析所預期。表1結果顯示，傳統分析強調之1997年金融風暴造成之中國區域影響提升與兩次泰國軍事政變所導致之美泰關係惡化，對美中泰三角關係之影響都不如911事件。既然911事件對美中泰三角關係的衝擊規模最大，3個國家行為（UC, CT, TC）因而產生結構轉變，故本文選擇911事件作為美中泰三方互動的重要分期。

²⁷ 這段期間泰美重要軍事合作案例包含，2003年泰國成為美國的主要非北約盟邦，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緬甸颶風災難營救作業，泰國成為救援作業營運中心（Chanlett-Avery and Dolven 2014）。

伍、美中泰三方互動分析（2001年9月到202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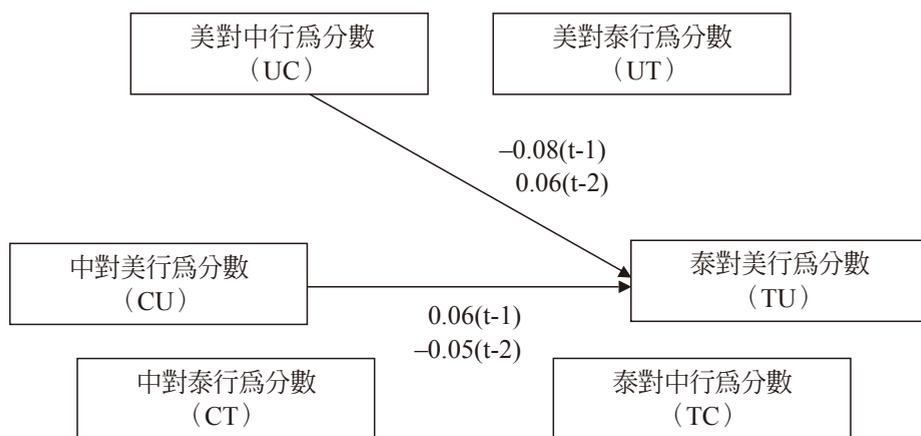
本文之研究設計為假設本月美中泰三方互動行為，為前2個月三方互動行為之函數。再根據前一節結果，本節將限制時間涵蓋範圍為911事件之後，亦即2001年9月至2020年3月。本文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回應下列研究問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符合三角關係之定義？第三方影響如何運作？相關統計結果已列於附錄3，為求詮釋方便，本文再依據附錄3結果整理為圖1，以說明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的影響力模式。整體而言，統計結果顯示，911事件後的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確實存在第三方效應，美中關係是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的重要變數，來自中國的間接第三方影響是改變泰國對美政策產出的重要因素，試詳述如下。

一、間接第三方影響：美中關係制約下的泰國對美政策

統計結果顯示，美中泰三方確實存在第三方影響，且為對第三方權力平衡模式，假設H2a-1成立。由圖1可知，自2001年以來美國對中行爲（UC）與中國對美行爲（CU）是影響泰國對美行爲（TU）的因素，此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顯著的因果關係與影響力模式。就實際政治意涵而言，美中關係是最重要變數，中國是美泰關係之重要第三方，第三方效應僅存於美泰關係。

首先，唯有美中關係具備影響其他行爲之能力。這個結果代表美中關係是影響美中泰三角互動的關鍵，同時泰國對美政策也將隨中國與美國之互動而調整。再者，統計結果也顯示，美中泰三方不存在直接第三方影響或對第三方自我調適模式，也代表除了假設H2a-1之外，統計結果並不支持其他所有其他假設（H1所有假設、H2a-2、H2a-3、H2b所有假設）。由此結果推敲，泰國並未在美中關係中扮演關鍵第三方角色，或是美國並未在中泰關係中扮演重要第三方角色，畢竟相關第三方假設並不成立。圖1顯示泰國相關行爲（TU, UT, TC, CT），並無法影響中美關係（UC, CU），美國相關行爲（UC, CU, UT, TU）也無法影響中泰關係（CT, TC）。這個結果的政治意涵有二，第一，即便泰國的地理樞紐地位重要，仍未達直接影響美中競逐的程度。美中關係可以影響泰國政策，但泰國行爲卻難以撼動美中關係；第二，美國缺乏直接影響或操作中

圖1 2001年9月後之美中泰三方互動影響關係圖



說明：1. 箭頭代表影響力模式，箭頭指向代表被影響之對象，而箭頭起源代表影響力來源。

2. 本圖判定影響力之標準為：若特定行為在5%統計水準以下顯著，則推論為具備影響力。相關統計結果請見附錄3。
3. 本圖箭頭所附之正負數字，來自附錄3整體在5%水準以下顯著變項之迴歸係數。由於本文研究設計納入2個落後期數，因此t-1代表前1個月行為之影響，t-2代表之前2個月之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ICEWS事件資料庫所得。

泰雙邊關係的政策工具，只能間接透過美國對中行為來影響泰國對美政策。綜上所言，統計分析顯示美中關係的重要制約角色，而且第三方效應（H2a-1）確實存在，但僅存在於中國對美泰關係之影響。就三角關係定義而言，因第三方效應確實存在符合三角關係的基本要件。但統計結果並未支持泰國在美中關係的第三方角色或美國在中泰關係的第三方角色。此一研究發現或可補充傳統三角分析不足之處。

此外，假設H2a-1成立代表在美泰關係中，來自中國的第三方影響力屬於間接第三方影響，影響力模式為「對第三方權力平衡」。圖1結果顯示，中國具備間接影響泰國對美行為之能力。不論是中國發起之對美行為或美國對中行為之改變，都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之變化。這個結果顯示，就泰國對美政策而

言，美中關係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也代表泰國作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的小國，對於美中強權互動的敏感性。根據圖1的迴歸係數判斷，整體而論中國對美國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之跟進，而美國對中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之平衡。換而言之，美中關係雖然重要，但是發動者為誰，由誰主動發起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不同的回應模式。圖1顯示，中國對美行為前2個月（ $CU_{t-1} + CU_{t-2}$ ）係數加總為0.01（ $0.06 - 0.05 = 0.01$ ）。係數為正數代表，整體而言中國對美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的同向變動，顯示泰國決策者確實有「與中同步對美關係」的現象。當中國對美增加合作程度，則泰國對美亦將加強合作，此舉代表泰國決策菁英判斷中美關係和緩，對美加強合作風險較低，同時也對美國釋出親善訊息，強化盟邦意識。當中國對美降低合作程度，則泰國對美亦將降低合作程度，此舉有意降低中國疑慮，同時對美釋出保持距離的政治訊息。總結而言，泰國的行為邏輯可以歸納為：「中對美合作，則我對美加碼；中對美衝突，則我亦對美降低合作」。另一方面，美國對中行為前2個月（ $UC_{t-1} + UC_{t-2}$ ）係數加總為-0.02（ $-0.08 + 0.06 = -0.02$ ）。係數為負數代表，整體而言美國對中行為將引發泰國對美行為的反向變動，顯示泰國對於美國對中作為的「暗中平衡」與「保持距離」。當美國對中增加合作程度，則泰國對美將降低合作程度。此行為模式可能顯示泰國決策者認為，美國強化對中合作代表目前局勢為中方優勢，因此微幅降低對美合作。此舉同時對中國釋出親善訊息，也警示美國應適度關注泰國的盟邦地位是否搖擺變化。當美國對中減少合作程度，則泰國對美將增加合作。此行為模式可能顯示泰國決策者認為，目前局勢為美方優勢，對中需求不在，所以微幅強化對美合作。此舉同時強化美國對泰國盟邦地位的信心，也確保美國對中衝突不致損及泰國利益。綜合來說，泰國的行為邏輯可歸納為：「美對中合作，則我對美觀望，美對中衝突，則我對美強化合作」。綜合觀察2001年以來之泰國平衡作為，泰國透過自身對美行為維持在美中之間的平衡，仍充分保有其「竹子外交」之外交風格。

若與既有之避險行為研究與三角關係分析作比較，三方互動模型之分析得以進一步說明泰國作為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的小國，其行為模式為何。說明如下：

第一，與權力資源途徑切入之三角關係分析不同，本文主張泰國為美中泰

三角關係中的小國之根據在於：泰國是唯一被影響或制約的行為者，同時泰國主動行為無法對三方互動造成任何影響。統計結果指出，美中關係可以制約泰國對美政策之產出，但是中國主動之行為（CU, CT）與美國主動之行為（UC, UT）並不受任何三方互動行為之制約。由此可知，由影響力途徑判斷，美國與中國皆為相對獨立行為者，顯示兩國於三角關係中的優越地位。另一方面，泰國主動之行為（TC, TU）也無法制約任何任何三方互動行為。因此，由影響力途徑判斷，泰國確為三角關係之弱小一方，畢竟影響力之展現是觀察權力的指標，而泰國不具備影響美中兩國之能力。

第二，相對於避險行為研究之靜態類別分析，不論是將泰國歸類為「典型避險」（Roy 2005）、「間接制衡」（Goh 2008）、「有限扈從」（Kuik 2008），類別分析無法具體表現小國之行為機制。本文之分析模型說明了911事件之後，泰國隨時針對美中關係調整之行為機制為何。主要是利用泰國對美政策，一方面對美國對中行為作反向微調，對中國對美行為進行正向微調。如果再考量地理鄰近的威脅因素，或可進一步詮釋泰國作為小國應對美國對中行為與中國對美行為之差異。就地理位置而言，泰國作為小國，臨近優勢強大的中國，同時美國作為條約盟邦卻遠在太平洋另一側。儘管東南亞國家因為傳統避險思維與中國的經濟利益，通常不願將中國定義為「威脅」（Goh 2007），但Walt（1990, 21-28）卻明確定義地理相近（geographic proximity）為威脅來源之一。在地理迫近，威脅較強的現實下，面對美中關係的變化，泰國僅以對美行為應對，維持泰國對中行為不受三方互動影響，這個選擇本身即有對中政策協調、自願配合的意涵。此外，泰國選擇與中同步對美行為，卻對美國對中行為暗中平衡，保持距離，顯示在以前後3個月為期的日常互動中，泰國對美行為模式應有考量中國作為鄰近大國，泰國必須以小事大，但決不凸顯中國威脅的謹慎。然而，日常互動的謹慎，無法確保中國強勢支配東南亞的最壞劇本不會發生，因此即使避險策略，有助於短期得利與日常應對，泰國也從未考慮放棄美國條約盟邦地位與對美軍事合作。泰國的選擇顯示，維持美國軍事力量區域存在，以應對中國地理迫近、實力強大的威脅，仍是泰國維持國家安全與生存的必要手段。

第三，作為小國，泰國對美中關係之平衡作為，都以「謹小慎微」作為原

則。由圖1觀察，所有顯著之迴歸係數皆為0.1以下，代表泰國對美行為因美中關係而變動之幅度很小。以美國對中行為為例，假設前1個月美國對中行為分數（ UC_{t-1} ）增加1分，則本月泰國對美行為（TU）將減少0.08分。兩者相差懸殊，代表美國對中行為分數變動較大，但泰國對美行為分數僅微幅變動。雖然泰國的回應規模微小，但統計結果顯示美國對中行為與泰國對美行為兩者時間連動機率極高，仍為不可忽視之模式。其餘各期美中關係顯著變項（ UC_{t-2} , CU_{t-1} , CU_{t-2} ）都有泰國回應「不成比例」的問題。

第四，為避免平衡意圖或作為過度引發美國關注，泰國回應美中關係的平衡作為都有「自我修正」的特性。圖1顯示，整體顯著的美國對中行為（UC）與中國對美行為（CU）都有不同期數之迴歸係數「先正後負」或「先負後正」的現象，造成正負相抵而總和效應較低的現象。綜合來看，統計結果顯示，泰國作為三角關係中弱小一方，其平衡作為既有生存所需的不得不然，也有低調謹慎，掩飾企圖的動機。

第五，在美中泰三角關係中，美國與中國之間不存在雙邊影響力模式，顯示在兩大強權雙方皆有不受制於人的意圖。依據圖1，美國對中行為（UC）與中國對美行為（CU）之間不存在任何影響力模式。這個結果代表美中雙方彼此互動的主要考量，可能不是美中泰三方互動，主要還是各自之全球戰略考量。對美中雙方而言，東南亞區域經營、對泰關係的經營，都牽涉雙方全球佈局，因此，雙方都有動機優先考量自身的全球戰略，同時避免受制於對方。然而，即使美中泰三角關係並非美中決策的主要考量，但美中關係仍是制約弱小一方（泰國）對美政策的因素，也是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顯著的影響力模式。

二、缺乏主動連結意圖的三角關係

即便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於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同時美中互動的確間接影響泰國的外交政策產出。但統計結果並不支持H2b系列假設，顯然三方決策者都沒有「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的現象。此結果亦代表美中泰三方都沒有在國內決策過程中，平衡本國對雙方作為的現象，缺乏將本國對雙方作為視為「彼此連結，一體兩面」的主動意願。畢竟「對第三方自我調適」是所有第三方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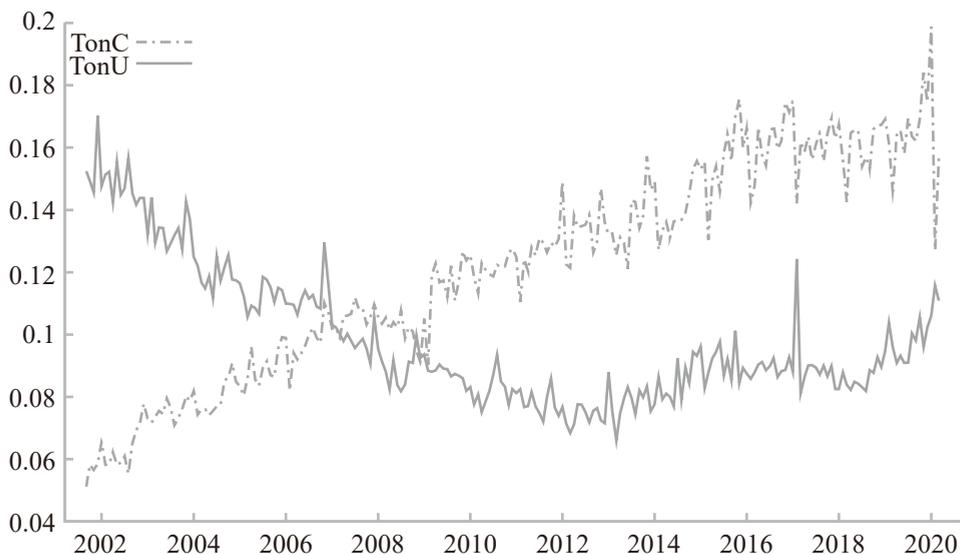
中，唯一主動行為者皆為同一國，且唯一因果皆發生於國內決策過程的影響力模式。

首先，圖1結果亦顯示美國對中行爲（UC）與美國對泰行爲（UT），兩者並無相互影響的現象，顯示假設H2b-1並不成立，美國外交決策內部並沒有「美中、美泰一盤棋」的主動連結意圖。統計結果指出美國國內決策過程並未出現「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現象，凸顯美國無意將對中行爲（UC）與對泰行爲（UT）連結的意圖，亦即對美國的決策者無意將美中競逐與美泰關係兩者作為彼此決策前提。如果對比台灣在中美關係中的第三方角色，黎寶文（2017, 27-29）曾發現美國對台行爲是影響美國對中決策的因素，從而判定台灣的間接第三方影響屬於「對第三方之自我調適模式」，美國對台與對中行爲有同比例、同方向變動的現象。顯然對於美國決策者而言，泰國與台灣在美中競逐中的重要性有所差異。台灣作為美中關係中的關鍵議題，美國巧妙地在台灣、中國間透過內部政策過程進行平衡，但是美國的外交決策顯然沒有將對中政策與對泰政策進行「議題連結」或「內部平衡」的現象。與台灣對比的結果再度印證：對美國而言，泰國並非美中關係關鍵第三方，也不足以改變美國對中決策。除此之外，統計結果顯示，美中互動（UC, CU）僅能影響泰國對美行爲（TU），卻無法影響美國對泰行爲（UT）。此結果也證明一組雙邊關係應區分為兩個對向行為的研究設計，將更有助於釐清因果關係。美泰關係兩個行為並非同時都被美中關係所制約，僅有泰國必須透過對美行爲（TU）隨時因應美中關係變化，但是美國則無需隨時調整對泰政策（UT）來因應美中關係變化。

其次，統計結果顯示，泰國對中行爲（TC）與泰國對美行爲（TU）沒有相互影響的現象，也不支持假設2b-3。此結果顯示泰國雖然為小國，但亦有其主體性，企圖在美中對抗結構下謀求最大利益。泰國作為需要避險的弱小一方，選擇以變動對美行爲，但卻維持對中行爲獨立於三方互動影響之外，這個選擇本身即有對中政策協調、自願配合的意涵。此一選擇也釋出「親美不代表一定要反中，親中也不必然反美」的政治訊息，目的自然是讓對中政策與對美政策脫鉤。讓「中國、美國分開處理」，則對內無需在政策產出過程內部平衡或進行議題連結，對外可增加小國迴旋空間。換而言之，此一結果也可以解釋

何以泰國持續維持美泰的軍事盟邦關係，但卻同時持續強化中泰之間的經濟，甚至軍事合作。再者，依據統計結果，三角關係中沒有任何一個行為有能力影響泰國對中行爲（TC）的產出。這個結果有兩個意涵。第一，911事件之後，泰國對中的決策並不受美中泰三方互動的制約，代表泰國只利用對美行為平衡美中關係，但泰國對中行爲不受美中關係影響。這個結果也呼應泰國的外交決策傾向「中國、美國分開處理」的推論，應屬合理。第二，三角關係中沒有任何一個行為有能力影響泰國對中行爲（TC）的結果，也代表影響泰國對中政策產出的因素應該在美中台三方行為之外。由此推論，傳統分析所建議之中泰經濟互惠與國內政治生存考量，應該主要是影響泰國對中政策產出，而非泰國對美政策。²⁸ 在經濟互惠考量方面，依據國際貨幣基金會資料（圖2），泰中

圖2 2001年9月後泰國對美中貿易依賴程度變化



說明：1. TonC代表泰中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TonU代表泰美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

2. 記錄單位為月份。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2021）。

²⁸ 至少統計結果顯示，911事件後，泰國對美政策受到美中關係變化之制約。

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TonC）在2001年9月後逐漸提高，而泰美貿易占泰國貿易比重（TonU）則日趨下降。由此可知，在泰國對中貿易依賴日益加深現實下，泰國因經濟發展考量確有動機強化對中合作。在國內政治考量方面，僅管塔克辛勢力與軍方的國內傾軋是後冷戰時期的泰國政治主軸，但中國一直都與雙方維持良好的關係，同時也從未對泰國的民粹威權或軍事統治提出任何批評，因此泰國之民選或軍事政治菁英皆有維持對中親善之動機。²⁹ 據此，泰國決策菁英自然沒有利用對中政策平衡美中競逐的動機，再次呼應「泰國對中行爲不受美中關係影響」與「泰國對中與泰國對美行爲彼此不相互影響」之統計結論。

最後，圖1顯示中國對美行爲（CU）與對泰行爲（CT）兩者間不存在相互影響之現象，也代表假設2b-2並不成立。此結果顯示在中國的決策過程中，並不存在「對第三方之自我調適」模式，也代表中國不認爲對美與對泰政策有必要相互遷就。因此，改善對泰關係，不必然是爲了離間美泰同盟；對美競爭，也不必然是對泰親善的動機。當然，這個結果亦可反面加以解讀，亦即即使泰國是東南亞區域的重要樞紐，但其重要性仍未達到中國必須調整對美政策加以因應的地步。不論如何，統計結果已經點出，與美國、泰國相同，中國也缺乏將對美、對泰視爲一盤棋的主動連結意圖，傾向分開考量，各自處理。

總結上述分析，統計結果支持間接第三方影響假設2a-1，並可引伸出五個意涵（假設驗證結果一覽，請見表3）。第一，進入911事件以來的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方互動的確符合三角關係的基本定義，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第二，第三方影響僅存在於中國對美泰關係之影響，中國的間接第三方影響是影響泰國對美政策的因素，其模式爲「對第三方之權力平衡」，中國與美國的互動將改變泰國對美政策的利益考量，因此泰國對美政策將隨時調整因應。第三，中國對美泰關係的間接第三方影響爲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存在的影響力模式，此結果也顯示無需分析各項權力要素，影響力分析途徑也能夠展現在美中泰三角關係中，泰國是唯一「受制於人」的弱小一方，而美中兩強皆能獨立

²⁹ 關於中國的不干涉主義與泰國菁英的考量，請見Zawacki（2017，章7，章9）與Pongsudhirak（2017，105-106）。

決策，不受制於人，且能透過兩強互動影響弱小一方的政策產出。第四，與既有避險行為相關研究作比較，相對於靜態類別分析，本文之分析模型說明了911事件之後，泰國隨時針對美中關係調整之行為機制為何。主要是利用泰國對美政策，一方面對美國對中行為作反向微調，對中國對美行為進行正向微調。此外，泰國的回應模式也充分凸顯竹子外交的低調平衡風格，泰國對中美關係的回應也以「謹小慎微」（回應規模小）、「自我修正」（正負相間）為特色。第五，統計分析也發現，美中泰三方在自身決策過程中，皆無「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的議題連結現象。所以，對泰國而言，親美不代表一定要反中，親中也不必然反美，對美、對中政策區分處理。同樣的現象也在美中兩強的內部決策過程存在，兩國對泰行為皆無法影響中美互動的決策過程，再次凸顯美中泰三方影響力的差異，也顯示泰國即便東南亞樞紐地位重要，但仍不足以影響美中的全球競逐。

表3 美中泰三角關係第三方影響假設檢驗結果

假設	結果
H1直接第三方影響	
H2間接第三方影響	
H2a對第三方權力平衡	H2a-1** 美中關係 (UC, CU) 影響泰國對美行為 (TU)
H2b對第三方自我調適	

說明：** 表示統計結果支持相關假設。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陸、結論

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探究：進入後冷戰時期的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互動模式為何？整理過往三角關係相關理論不難發現，「第三方影響」的存在是決定三角關係是否成立的關鍵。在研究途徑方面，究竟應透過何種途徑探究第

三方影響的存在與其運作？經回顧相關戰略三角理論脈絡中如何處理「權力失真」議題，本文決定採取強調影響力模式的「權力即關係」途徑著手，透過三角關係等於三組雙邊關係等於六個具方向性的國家行為的研究設計，利用ICEWS事件資料庫探究三個子議題：一、促成美中泰三方互動結構轉變之重要政治事件為何？二、美中泰三方互動是否存在第三方影響？是否成立三角關係？三、若是，則美中泰三角關係內部行為如何相互影響？

本文原擬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探討ICEWS事件資料庫自1995年1月至2020年3月以來的美中泰三方行為記錄，但由於歷時長久，必須確認美中泰三方互動模式未曾經歷「結構轉變」，統計分析方有意義。在相關文獻的分析中，影響後冷戰時期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因素與事件可歸納為三大項：美國戰略轉變（911事件、亞太再平衡、印太戰略提出、美中貿易戰）、中國政經影響（1997金融風暴、中泰自貿協定簽署、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與泰國內政（塔克辛執政、2006年與2014年軍事政變）。本文利用鄒檢定分析發現，後冷戰時期的美中泰三角關係的確曾經發生結構轉變。911事件的發生，直接改變了美國對中行爲、中國對泰行爲與泰國對中行爲的既有模式，是影響規模最大的事件。由此可知，美國全球戰略的轉變，實是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是否發生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而中國因素與泰國的內政因素影響有限。這個結果可引伸出兩項政治意涵。首先，在美中關係中，僅有美國對中行爲單邊因911事件發生結構轉變，但未明顯改變中國對美行爲的既有行爲模式。由此可知，911事件後美國出於全球反恐戰略之需要，改變了既有美國對中行爲模式，而中國顯然沒有類似之改變動機。再者，911事件並未造成美泰關係的結構轉變，而且根據ICEWS資料庫的紀錄，911事件後中泰關係合作程度確有增加，這些現象都代表關於後冷戰時期「泰國轉向」的論述，或許應修正為「美泰關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較為符合現實。而在統計意涵上，由於911事件促成美中泰三角關係內多個國家行為之結構轉變，本文將時間跨距修正為2001年9月至2020年3月，以確保之三方互動分析之推論不致偏誤。

關於美中泰三角關係的內部動力分析，本文假定本月之美中泰三方互動為過去三方互動之結果，採用落後2期的向量自我迴歸法進行分析。統計結果顯示來自中國的間接第三方影響確實存在，也代表美中泰三方互動符合三角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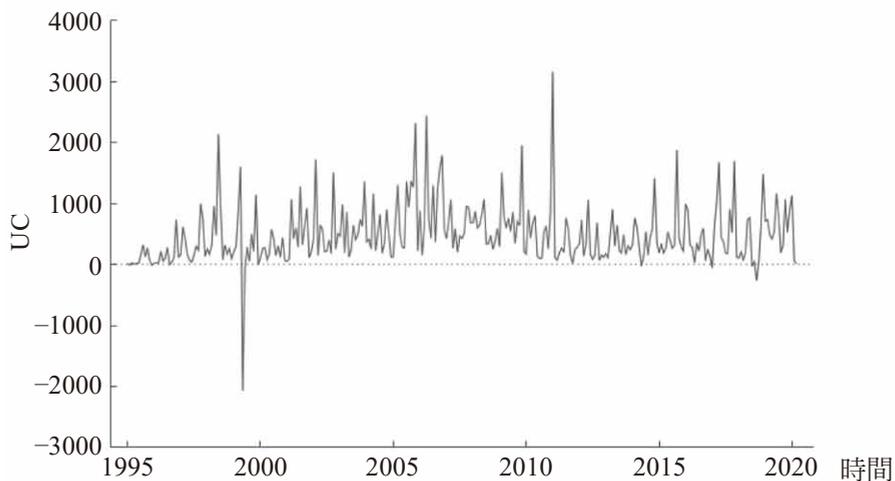
的基本定義。統計結果也指出，美中關係（包含美國對中行爲與中國對美行爲）將影響泰國對美政策的產出，代表中國是美泰關係的關鍵第三方，其第三方運作模式屬於「對第三方之權力平衡」。這個結果代表中國與美國的互動將改變泰國對美政策的利益考量，故泰國必須隨時調整對美政策以因應情勢變化。由於此模式爲美中泰三角關係中唯一存在的影響力模式，不難研判美中關係實爲影響美中泰三角關係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泰國的回應模式也凸顯竹子外交的低調平衡風格，充分展現泰國作爲弱小一方的避險思維。本文的分析結果，不僅限於過往避險研究之靜態行爲類別分析，而進一步說明了泰國面對中美兩強的戰略競爭之行爲機制爲：利用自身對美政策爲工具，跟隨中國對美行爲作同向變動，但與美國對中行爲作反向平衡。此外，也由於泰國的弱小地位，使得泰國對中美關係的回應也以「謹小慎微」（回應規模小）、「自我修正」（正負相間）爲特色。最後，美中泰三方在自身決策過程中，皆無「對第三方自我調適」的議題連結現象，代表美中泰三方都傾向將對第三國與對對手國政策個別處理，缺乏主動連結的企圖。在中國崛起的後冷戰時期，對泰國而言，親美不代表一定要反中，親中也不必然反美，所以，後冷戰時期的泰國並非「轉向親中」，而是「美泰關係穩定，但中泰關係升溫」。同理，對於美中兩國而言，對泰關係的進展不可能優先於美中全球競逐的考量。由此再度凸顯美中泰三方的權力差距，泰國的區域重要性只能服膺於美中全球競逐的考量，絕無遷就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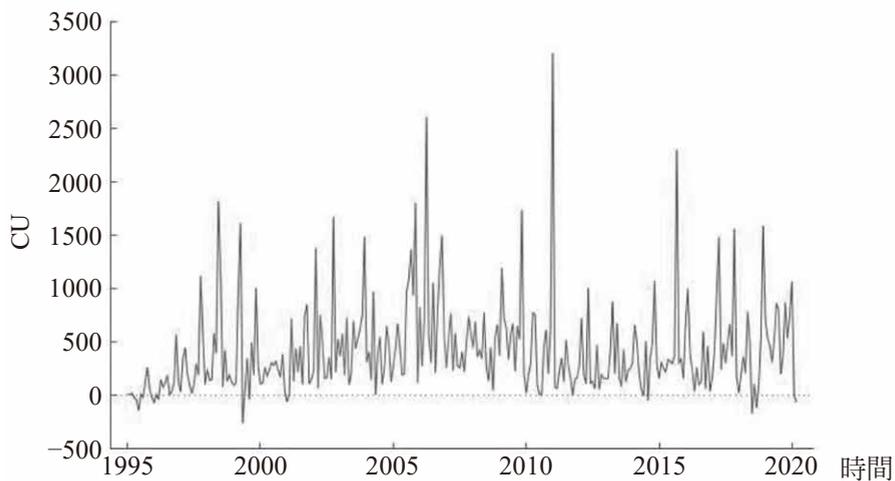
（收件：110年1月11日，接受：110年10月7日）

附錄1 各行爲變項時間序列圖 (1995-20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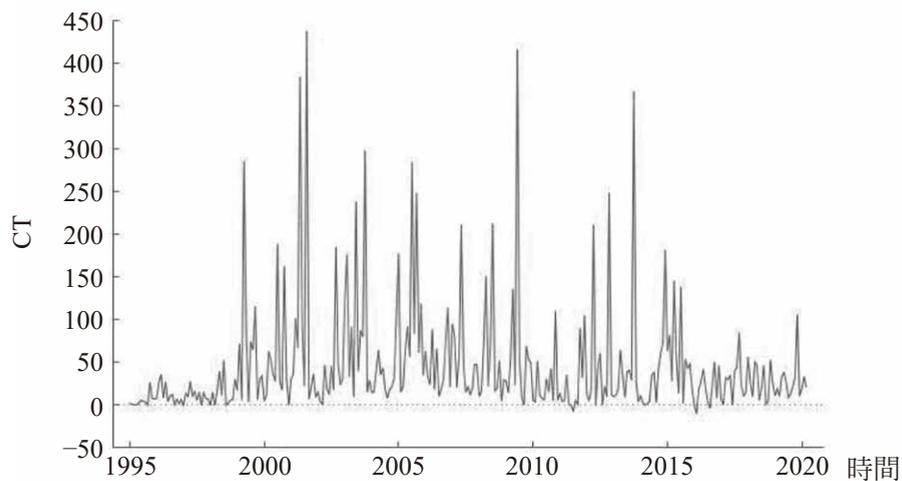
每月美國對中行爲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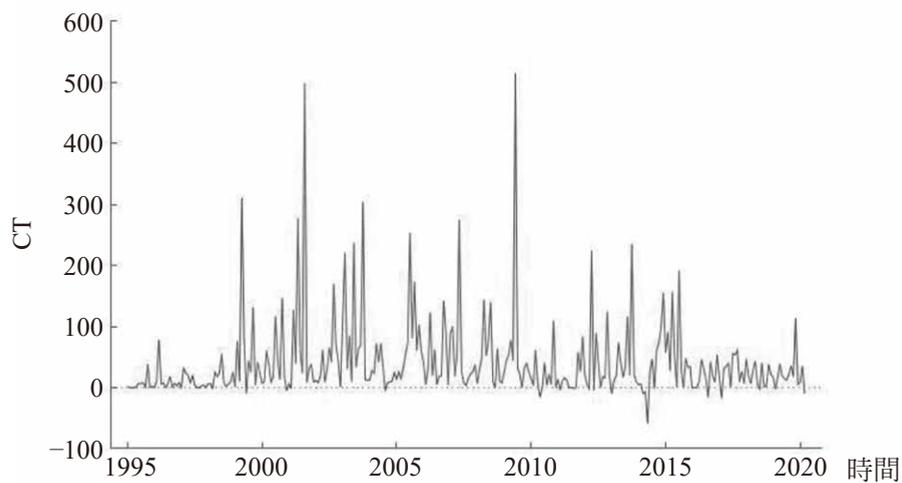
每月中國對美行爲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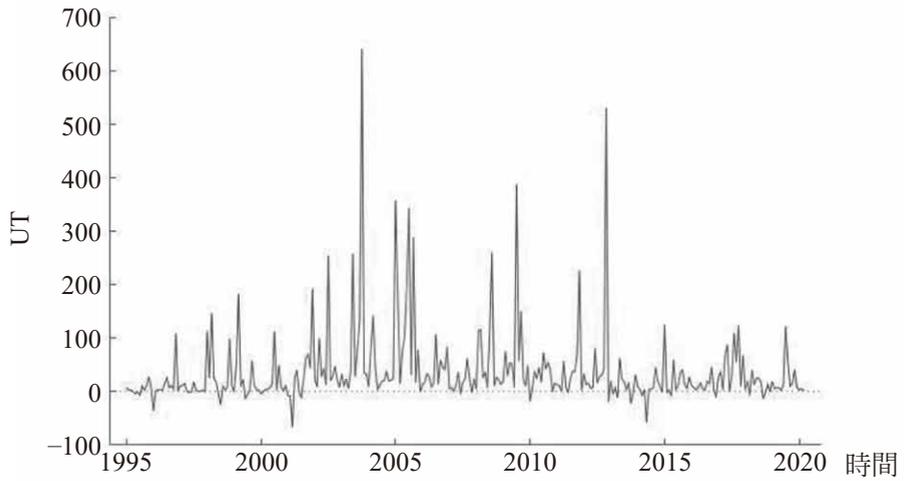
每月中國對泰行為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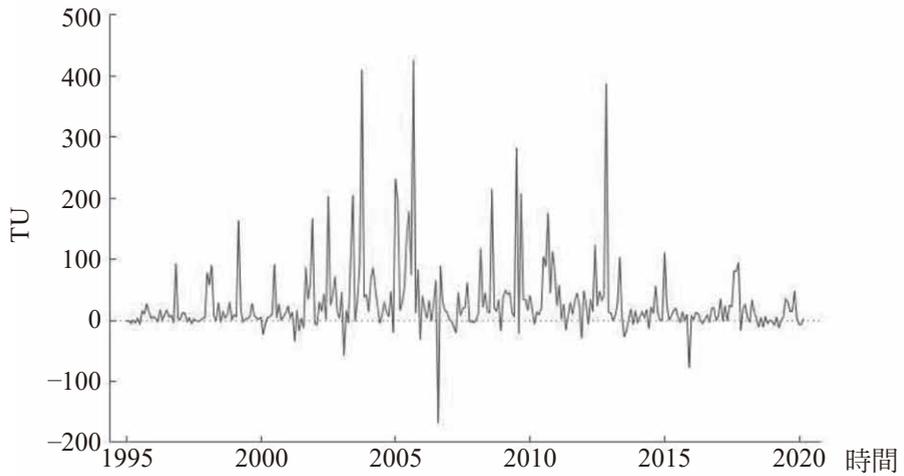
每月泰國對中行為分數



每月美國對泰行為分數



每月泰國對美行為分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ICEWS資料庫。

附錄2 時間序列變項檢定結果

時間序列變項自我相關檢定結果 (1995-2020/3)

變項	落後期數為3	落後期數為6	落後期數為12	落後期數為24
UC	10.0711*	18.6693**	46.0681**	76.7994**
CU	9.0740*	15.6208*	33.2593**	48.6919**
CT	15.3490**	19.1526**	23.8089*	42.6171*
TC	10.7484*	15.0060*	16.1340	33.8046
UT	11.9829**	23.4544**	26.5865**	56.3533**
TU	15.5466**	27.2412**	32.5234**	55.1058**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p < 0.10$, $*p < 0.05$, $**p < 0.01$ 。

2. 本文採用Portmanteau white-noise test檢定自相關現象。該檢定之虛無假設為特定期數無自我相關現象。表中各項數值為Q統計量 (Q statistic)。上表顯示所有序列皆存在自我相關現象，必須加以控制。

時間序列變項單根檢定結果 (1995-2020/3)

變項	ADF檢定結果	ADF檢定結果 (含趨勢)	ADF檢定結果 (一階差分)	ADF檢定結果 (一階差分含趨勢)
UC	-3.90832 (7)**	-3.9156 (7)*	--	--
CU	-14.7295 (0)**	-14.8893 (0)**	--	--
CT	-7.6117 (2)**	-7.60663 (2)**	--	--
TC	-7.94144 (2)**	-7.93902 (2)**	--	--
UT	-5.72871 (4)**	-5.72482 (4)**	--	--
TU	-5.55511 (4)**	-5.56351 (4)**	--	--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p < 0.10$, $*p < 0.05$, $**p < 0.01$ 。

2. 本文採用增廣性Dickey-Fuller檢定 (ADF test) 檢驗單根現象。該檢定的虛無假設為有單根，無單根則為定態 (stationary)。表格內數值為t-statistic。上表顯示所有序列皆為定態。
3. 括弧內之數字為最佳落後期數，由統計軟體Gretl依AIC標準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a)，最大期數15選定。

時間序列變項ARCH檢定結果 (1995-2020/3)

變項	落後期數為3	落後期數為6	落後期數為12	落後期數為24
UC	0.869	1.851	5.798	10.6572
CU	0.466	1.810	3.005	7.966
CT	9.375*	11.224+	12.588	15.536
TC	1.957	2.342	2.995	5.957
UT	0.137	1.036	1.647	18.884
TU	0.485	0.806	5.944	28.819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2. 本文採用Lagrange Multiplier檢定檢驗自我相關條件異質變異 (ARCH) 現象。該檢定之虛無假設為特定期數無ARCH現象。表格內數值為 χ^2 statistic。
3. 上表顯示中國對泰國行為 (CT) 可能存在ARCH現象，將強化事後檢測。

附錄3 美中泰三方互動模型統計結果

	(1) 美國對中 行爲分數 (UC)	(2) 中國對美 行爲分數 (CU)	(3) 美國對泰 行爲分數 (UT)	(4) 泰國對美 行爲分數 (TU)	(5) 中國對泰 行爲分數 (CT)	(6) 泰國對中 行爲分數 (TC)
UC _{t-1}	0.43* (0.21)	0.25 (0.20)	0.05 (0.04)	-0.08* (0.03)	0.01 (0.03)	0.03 (0.03)
UC _{t-2}	-0.10 (0.21)	0.13 (0.20)	0.07+ (0.04)	0.06* (0.03)	0.04 (0.03)	0.01 (0.03)
CU _{t-1}	0.36 (0.22)	-0.20 (0.21)	0.05 (0.04)	0.06* (0.03)	0.02 (0.03)	0.04 (0.03)
CU _{t-2}	0.07 (0.22)	0.10 (0.21)	0.07+ (0.04)	-0.05+ (0.03)	0.03 (0.03)	0.007 (0.03)
CT _{t-1}	0.77 (1.32)	1.05 (1.25)	0.22 (0.23)	0.19 (0.18)	0.05 (0.18)	0.07 (0.18)
CT _{t-2}	0.89 (1.32)	0.14 (1.25)	0.22 (0.23)	0.15 (0.18)	0.02 (0.18)	0.17 (0.18)
TC _{t-1}	1.31 (1.25)	1.66 (1.19)	0.03 (0.21)	0.01 (0.17)	0.04 (0.17)	0.08 (0.17)
TC _{t-2}	0.16 (1.27)	0.87 (1.18)	0.17 (0.21)	0.13 (0.17)	0.05 (0.17)	0.08 (0.17)
UT _{t-1}	0.57 (0.75)	0.25 (0.71)	0.08 (0.13)	0.004 (0.10)	0.006 (0.10)	0.01 (0.10)
UT _{t-2}	0.16 (0.75)	0.25 (0.71)	0.14 (0.13)	0.16 (0.10)	0.07 (0.10)	0.08 (0.10)
TU _{t-1}	0.92 (0.90)	0.48 (0.86)	0.05 (0.16)	0.03 (0.12)	0.03 (0.12)	0.02 (0.12)
TU _{t-2}	1.41 (0.89)	1.45+ (0.85)	0.09 (0.15)	0.0008 (0.12)	0.02 (0.12)	0.10 (0.12)
const	409.68*** (65.84)	365.22** (62.51)	28.13* (11.30)	18.70* (9.08)	35.14** (8.90)	30.93** (8.88)
N	223	223	223	223	223	223
R ²	0.102	0.088	0.080	0.134	0.0351	0.0334

資料來源：作者利用ICEWS資料庫所得之分析結果。

說明：1. +、*、** 分別表示特定期數之個別變項在10%、5%、1%統計水準下顯著。

2. 灰底粗體表示該變項落後1期與落後2期之總和效應在5%統計水準以下顯著。本模型中僅有第4式中美國對中行爲（UC）與中國對美行爲（CU）爲總和效應顯著。特別是中國對美行爲（CU）雖然落後1期（ CU_{t-1} ）達5%統計水準，落後2期（ CU_{t-2} ）則未達水準，但2期之總和效應仍在5%統計水準顯著。

3. 括弧內爲標準差，統計結果通過自我相關與ARCH事後檢測。

4. 本模型分析以統計軟體Gretl（2020d版）執行。

The Interaction of the U.S.-China-Thailand Triangl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 Time-Series Analysis Approach

Pao-wen Li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Facing China's ris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w do great power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ailand, who is famous for its bamboo strate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analyzing (1) what events cause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triangle; (2) how the third-party effect works in this triangle; (3) how the three actors influence each other. By applying time-series analyses,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911 attack had led to a structural change for the triangle. The impact of China's political-economic factors and Thai politics was not as significant as expected. On the other hand, statistical results also reveal the pattern that Thailand tended to balance the US-China interactions with it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iland's sensitivity and prudence to power politics.

Keywords: United States, China, Thailand, Triangular Relations, Event Data

參考文獻

- 包宗和，1999，〈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臺海兩岸三角互動為例〉，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337-364，台北：五南出版社。Bau, Tzong-ho. 1999. "Zhanlue sanjiao jiaose zhuanbian yu leixing bianhua fenxi: yi meiguo he taihai liangan sanjiao hudong wei li" [An Analysis about the Shifts of Role and Type in Strategic Triangle: the U.S.-China-Taiwan Triangular Interaction as an Example]. In Tzong-ho Bau and Yu-Shan Wu, eds., "*Zhengbian zhong de liangan guanxi lilun*" [The Theories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Debate], pp. 337-364. Taipei: Wu-nan Culture Enterorise.
- 吳玉山，1997，《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出版社。Wu, Yu-Shan. 1997. *kangheng yu hucong: liangan guanxi xinquan* [Balance and Bandwago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pei: Cheng-Chung Bookstore.
- 吳玉山，2000，〈非自願的樞紐：美國在華盛頓－台北－北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論叢》，12：122-189。Wu, Yu-Shan. 2000. "Feizihyuan de shuniu: meiguo zai Huashengdun-Taipei-Beijing zhijian de diwei" [Unintending Pivot: The US Between Taipei and Beijing].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122-189.
- 陳佩修，2009，〈泰式民主的脆弱性－2006年919軍事政變與泰國民主的逆轉〉，《臺灣民主季刊》，6（1）：73-106。Chen, Pei-Hsiu. 2009. "Taishi minzhu de cuiruoxing - 2006 nian 919 junshi zhengbian yu Taiguo minzhu de nizhuan" [The Vulnerability of Democracy in Thai Style: The Coup d'état of 19 September 2006 and the Reversal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ailand].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6 (1): 73-106.
- 陳佩修，2009，〈泰國的軍事政變與政治變遷〉，《東吳政治學報》，27（3）：65-116。Chen, Pei-Hsiu. 2009. "Taiguo de junshizhengbian yu zhengzhi bianqian" [Coups D'éta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ailand].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3): 65-116.

- 陳佩修，2010，〈東南亞的恐怖主義演進與安全形勢變遷〉，《臺灣東南亞學刊》，7（2）：63-84。Chen, Pei-Hsiu. 2010. “Dongnanya de kongbuzhuyi yanjin yu anquan xingshi bianqian” [The Evolution of Terrorism and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7 (2): 63-84.
- 黎寶文，2015，〈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第三方影響：一個時間序列的分析途徑〉，《東吳政治學報》，33（3）：207-270。Li, Pao-Wen. 2015. “Meiguo zai liangan guanxi zhong de disanfang yingxiang: yige shijian xulie de fenxi tujing”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 Time Series Analysis Approach].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 (3): 207-270.
- 薛健吾，2020，〈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2013-2018）〉，《遠景基金會季刊》，21（2）：1-54。Hsueh, Chien-wu Alex. 2020. “zhongguo yidaiyilu zai diyige wunian de jinzhan yu yingxiang” [The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3-2018)]. *Prospect Quarterly*, 21 (2): 1-54.
- Baldwin, David A. 2016.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 Conceptual Approa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ldwin, David Allen. 200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77-91. London: Sage.
- Boschee, Elizabeth, Jennifer Lautenschlager, Sean O’Brien, Steve Shellman, James Starz, and Michael Ward. 2015. “BBN ACCENT Event Coding Evaluation”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file.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GBAGXI&version=30.0>. (June 27, 2021).
- Boschee, Elizabeth, Jennifer Lautenschlager, Sean O’Brien, Steve Shellman, James Starz, and Michael Ward. 2015. “CAMEO.CDB.09b5.Pdf.”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file.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SCJPXX> (October 17, 2020).

- Boschee, Elizabeth, Jennifer Lautenschlager, Sean O'Brien, Steve Shellman, James Starz, and Michael D. Ward. 2015. "ICEWS Coded Event Data."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075> (December 15, 2020).
- Bunyavejchewin, Poowin. 2012.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fter the Incident of 9/11: The Richness and Weakness of Realist Tradition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Kasetsart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33 (1): 161-169.
- Busbarat, Pongphisoot. 2016. "'Bamboo Swirling in the Wind':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 Im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8 (2): 233-257.
- Busbarat, Pongphisoot. 2017. "Thai-US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Unty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Asian Security*, 13 (3): 256-274.
- Chambers, Paul. 2004. "U.S.-Thai relations after 9/11: A new era in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6 (3): 460-479.
- Chanlett-Avery, Emma, and Ben Dolven. 2014. "Thailand: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https://www.hsdl.org/?view&did=755846> (September 14, 2020).
- Chantasawat, Busakorn. 2006. "Burgeoning Sino-Thai Relations: Heightening Cooperation, Sustaining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 (1): 86-112.
- Chow, Gregory. 1960. "Tests of Equality between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 *Econometrica*, 28 (3): 591-605.
- Clinton, Hillary.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September 14, 2020).
- Dahl, Robert A.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 (3): 201-215.
- Dittmer, Lowell. 1981.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33 (4): 485-515.
- Goh, Evelyn. 2007.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a Challeng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0 (4-5): 809-832.
- Goh, Evelyn. 2008. "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 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2 (3): 113-157.
- Goldstein, Joshua S, and John R Freeman. 1990. *Three-Way Street: Strategic Reciprocity in Worl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stein, Joshua S, and Jon C Pevehouse. 1997. “Reciprocity, Bully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Bosnia Conflic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3): 515-529.
- Goldstein, Joshua S, Jon C Pevehouse, Deborah J Gerner, and Shibley Telhami. 2001. “Reciprocity, Triangular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1979-97.”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 (5): 594-620.
- Haacke, Jürgen. 2002. “Seeking Influence: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ASEAN after the Asian Crisis.” *Asian Perspective*, 26 (4): 13-52.
- He, Kai. 2008.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 (3): 489-518.
- Hewison, Kevin. 2018. “Thailand: An Old Relationship Renewed.” *The Pacific Review*, 31 (1): 116-30.
- IMF. 2021.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https://data.imf.org/?sk=9d6028d4-f14a-464c-a2f2-59b2cd424b85&sId=1409151240976>. (June 27, 2021).
- Kuik, Cheng-Chwee.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2): 159-185.
- Lautenschlager, Jennifer, Steve Shellman, and Michael Ward. 2015. “ICEWS Event Aggregations.” <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28117> (October 17, 2020).
- Mathews, Bradley. 2003. “Bangkok’s Fine Balance: Thailand’s China Debate.” https://apcss.org/Publications/SAS/ChinaDebate/ChinaDebate_Mathews.pdf (September 10, 2020).
- Mattern, Janice Bially. 2008. “The Concept of Power and the (Un)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s., *The*

-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91-69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ohn J. 1990.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1): 5-56.
- Ministry of Commerce (Thailand). 2020.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f Thailand." <http://tradereport.moc.go.th/TradeEng.aspx> (December 15, 2020).
- Pevehouse, Jon C, and Joshua S Goldstein. 1999. "Serbian Compliance or Defiance in Kosovo?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al-Time Predic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 (4): 538-546.
- Pongsudhirak, Thitinan, 2020. "Thailand's Strategic Drift." <https://www.aspi.org.au/report/thailands-strategic-drift-domestic-determinants-amidst-superpower-competition> (September 10, 2020).
- Pongsudhirak, Thitinan. 2016. "An Unaligned Alliance: Thailand- U.S. Relation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sian Politics & Policy*, 8 (1): 63-74.
- Pongsudhirak, Thitinan. 2017. "Thailand After King Bhumibol: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mplications." I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Japan, ed., *Security Outlook of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pp. 97-106.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 Pongsudhirak, Thitinan. 2018. "U.S.-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Under Trump." In John Riege ed., *ASIAN VIEWS ON AMERICA'S ROLE IN ASIA: An Early Assessment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pp. 13-16. San Francisco, CA: The Asia Foundation.
- Prasirtsuk, Kitti. 2013. "The implications of U.S. strategic rebalancing: A perspective from Thailand." *Asia Policy*, 15: 31-37.
- Prasirtsuk, Kitti. 2017. "An Ally at the Crossroads: Thailand in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pp. 115-132. Australia: ANU Press.
- Roy, Denny. 2008.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7 (2): 305-322.

- Schrodt, Philip. 2007. "Cameo Scale: Version 0.5b1." <http://eventdata.parusanalytics.com/cameo.dir/CAMEO.SCALE.txt> (December 15, 2020).
- Shambaugh, David. 2002.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Current History*, 101 (656): 243-249.
- Sims, Christopher A. 1980. "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 *Econometrica*, 48 (1): 1-48.
- Tammen, Ronald L., Jacek Kugler, Douglas Le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rid, and A.F.K. Organski.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October 9, 2020).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October 9, 2020).
- United States. 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October 9, 2020).
- United States. 2020.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0.20.pdf> (November 9, 2020).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Walt, Stephen M. 1990.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u, Yu-Shan. 2011. "Strategic Triangle, Change of Guard, and Ma's New Course." In Cal Clark, e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30-61.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Zawacki, Benjamin. 2017. *Thailand: Shifting Ground Between the US and a Rising China*. Asian Arguments. London, UK: Zed Books Limited.